

學府紀聞

私立中國公學

發行人：陳明章

出版者：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民權東路五巷三弄三號二樓

電話：七七一〇〇五六

郵政劃撥：一〇七七九九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四七號

印刷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訂者：僑發裝訂廠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
價：二十一冊新臺幣六二〇〇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學府紀聞

總目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復旦大學
國立北京大學	私立大夏大學
國立北洋大學	私立中國公學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私立金陵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私立聖約翰大學
國立武漢大學	私立輔仁大學
國立河南大學	私立齊魯大學
國立東北大學	私立燕京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南開大學	
	總編

目 次

簡史及沿革

中國公學史略	佚名	一
中國公學校史(一)	馬君武	五
中國公學校史(二)	胡適	一五
中國公學校史(三)	蔡元培	一七
校董與校董會概述	編輯小組	二〇

現存教育部有關中公重要檔案

民國十六年以前檔案		一三
民國十六年以後檔案		二七
上海「一二八」戰爭校舍被毀後交涉復校檔案		四五

大陸形勢雜亂中重慶部份同學爭取復校檔案.....四八

創校先烈先賢傳略

姚洪業烈士傳.....	五一
張邦傑先生傳.....	五三
梁喬山先生傳.....	五六
馬君武先生傳.....	五七
于右任先生傳.....	六一
王雲五先生傳.....	六四

師長墨寶

王敬芳先生墨寶.....	七三
梁啓啓先生墨寶.....	七四
張嘉森先生墨寶.....	七四
蔡元培先生墨寶.....	七五
馬君武先生墨寶（一一二）.....	七六

胡適先生墨寶（一一三）	七七
于右任先生墨寶	七八
楊亮功先生墨寶	七九
高一涵先生墨寶（一一二）	八〇
朱經農先生墨寶	八二

師友憶往

追憶在中國公學的生活和公學發生風潮的

經過	胡適	八三
中國新公學	王雲五	一〇八
吳淞江上		
——我在中國公學一段辦學的經歷	楊亮功	一二五
胡適之先生與中國公學		
——為胡先生逝世周年紀念而作	楊亮功	一三八
中國公學創辦的回憶	張承標	一五二
憶中國公學	梁實秋	一五八

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

——從中國公學學生分會談起………	李玉階……一六一
中國公學的回憶………	丘漢平……一七一
從中學到大學………	阮毅成……一七五
中國公學在臺復校未成記………	阮毅成……一九四
母校瑣憶………	黃冠南……二〇五
我在中公的片段回憶………	胡頌平……二一二
追念母校「中國公學」和諸師長………	史次耘……二二一
憶中國公學………	江厚壠……二三三
中國公學和兩位最可崇敬的校長………	羅佩光……二五五
吳淞江畔的追憶………	繆天華……二七七
我與中公………	周昆田……二八三
悼念師友的詩………	鍾鼎文……二九〇
中國公學與我………	蔣昌煥……三〇三
吳淞江畔之母校——「中公」………	吳正之……三一六
回憶我在大學四年之經過………	饒子桓……三二九

回憶母校——中國公學	徐鳴亞	三三四
大學讀書時代生活瑣憶	趙埜波	三五六
中國公學對我的影響	倪思穀	三五九
回憶中的中國公學	樊振邦	三六五
刻骨銘心	張和重	三七六
中國公學馬校長的生平事蹟	謝介屏	三八〇
回憶母校——中國公學	田疊波	三八七
回憶在中國公學求學時生活片段	富靜岩	三九二
潮流	王文漪	三九五
編後語	編輯小組	三九九

簡史及沿革

中國公學史略

佚名

中國公學之發起，實始於清光緒乙巳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之役；時歸國者近千人，謀自建學以免鄰辱，得閩侯鄭孝胥助金千元，乃於丙午春擇地滬上租屋開學。嗣以諸事棘手，窘迫日甚，幹事姚洪業債而投江，聞者悼焉。南通張謇、鳳凰熊希齡等皆任維持，贊助者日衆，規模始具。葦縣王敬芳、澧縣黃兆祥、仁壽張邦傑分任齋務、教務、庶務各科幹事，推鄭孝胥爲校長，是時學生逾三百人，除中學外次第附設師範、理化、英文、算學各專修科，以應時需。適溧水端芳膺江督，命王敬芳走謁京師，請允維持，鄭熊等相繼進言，乃自丁未年始歲助萬二千元，又撥吳淞公地百餘畝爲校址。戊申春鄭孝胥辭校長，新建夏敬觀繼其任，並組董事會，推張謇爲會長。

。張邦傑奔走各省籌建築金，卒得大清銀行營口經理羅詒助借銀十萬，用建校舍。清宣統己酉，夏秋之間，邦傑力疾督工，盡瘁而死；迨校舍落成，邦傑不及見矣。王敬芳、黃兆祥繼張君志奔走募款，於是湖北、浙江、四川、江西各省相繼補助，訖宣統末常款達兩萬餘元。先是已添設工科，大學預科，並為籌辦大學計，王敬芳赴南洋羣島募捐，所至僑商歡迎，方謂鉅款可期，及革命軍興，僑商急籌軍費，不暇顧及公學，亦因時變輟課，計自丙午創始至此六年矣。

二

民國始建，各省財政俱苦不足，前六年間所籌得二萬元餘之補助常款，一律停止。臨時政府孫文、黃興等加入維持之列，籌款開校，並添招政法商專門科三班，舊日規模稍變更矣。至二年夏，二次革命起，校舍為革軍所據，學生星散，及事平返校，負責無人，情勢岌岌，不可終日。是年冬學生代表李蔭穠赴京師告急於王敬芳，時敬芳任國會議員，念公學創始之艱，悲亡友遺澤之涙，商於其友通許胡汝麟協力支撐，移董事會於北京，推薪水湯化龍為董事長，王敬芳為校長，敬芳時輔汝麟代表豫人與英商福中公司爭礦權於京師，不克南下，先後派劉星楠、張坤、張仲友為總務幹事，代行校長職權。民國三、四年間，汝麟、敬芳為公學籌款，東羅西掘，僅免傾覆，蓋得熊希齡、湯化龍扶持之力為多。至四年夏福中公司交涉告竣。福中總公司成立，汝麟、敬芳乃謀之福中公司代表堪銳克，由福中每年捐助公學二萬元，公學得有常款，此其第二次矣。

五年夏政法商各班畢業，僅餘中學數十人。時雲南反對帝制功成，新會梁啟超歸自粵，讀禮滬上，公學推爲校長。爲建設大學計，乃議結束舊局，分送中學諸生於滬上各中學，會教育部請暫借校舍與同濟醫工學校，梁啟超又因參戰北上，公學乃中途停頓。

三

同濟初借校舍時，本言短期，乃時經數載，遷延不即歸還，八年春董事熊希齡、夏敬觀、梁維嶽、王敬芳等催促教育部歸還校舍，校友劉秉麟、李蔭穠、安殿磐、高陽、王開疆等亦協力相助，方與確訂續借一年，而公學於暑假後，先借威海衛路德人舊辦小學校舍內開課，重集董事會，推希齡爲會長，王家襄爲副會長，王敬芳爲校長，范濂、胡汝麟、袁希濤、夏敬觀、葉景葵、梁維嶽、王敬芳等爲常務董事，議定開辦商科專門及中學。先是公學停頓時，積欠外債萬餘元，開學後王敬芳商之福中洋行總理費趨福補撥停頓期間助款，除還債外，尙餘四萬餘元，以備填補每年常款之不足，九年梁維嶽病歿，常務董事缺額，董事會推梁啟超補之，王敬芳因任福中總理，不克住校辦事，乃以李蔭穠爲事務長，劉秉麟爲教務長，分代其職。十年春秉麟留學英倫，蔭穠亦於是夏辭職歸蜀，敬芳乃請杭縣張東蓀爲代理校長，課程內容逐漸改革，中學實行三三新制，商科亦分銀行、會計、秘書、貿易，各門講授，以期實用。十一年春寶山張嘉森自歐歸國，公學推爲籌辦大學主任，又由常務董事呈准政府撥六厘公債一百萬元爲補助金。十一年秋張

東蓀因事繁固辭，適陳筑山歸自美，敬芳請其任代理校長職務，即首將原有專門商科提高程度改升大學。十二年夏以商科大學來學者日盛，勢不得不力圖擴充，又因添辦高級中學，吳淞校舍實不敷用，故將商大遷移上海，以滬上爲全國商業之總匯，中外貿易之樞紐，便於實地考察。十三年廢除代理校長，改設學長，仍由張東蓀任之，同年秋江浙搆兵，吳淞校舍爲浙軍占用，其時戎馬縱橫，師生星散，不得已宣告停辦高中一年。十四年春大學遷回吳淞，聘請胡石青爲代理校長，同時延約海外歸國名彥，計劃添設哲學、政治、經濟諸系，酌採倫敦大學之經濟政治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之精神，取其志在諳習實務者，得自由以窺其學理，且此制得隨時放大，自成專科，應時代之要求，而有新課之增設也。十四年秋始添設哲學、政治、經濟三系。

中國公學校史(一)

胡適

中國公學的發起，在清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那時中國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新頒的取締學生規則，認為侮辱中國，故議決全體歸國。歸國的學生既多，遂發起辦一個理想的學校，容納這些抗議回國的學生。因為這學校含有對外的意義，歸國學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故名為「中國公學」。

中國公學成立於丙午年春天，其時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鬆懈，許多官費學生多紛純回去復學；而上海人士初見一大羣剪髮洋服的學生自辦學校，多起猜疑，官吏指為革命黨，社會疑為怪物。故贊助的人很少，經費困難，學校遂陷於絕境。幹事姚洪業先生激於義憤，遂於四月六日投江自殺，以身殉學校，遺書數千言，說：

我之死，為中國公學死也。

姚烈士列舉中國公學與中國前途之關係，凡有五點，最重要的是：

(一) 中國公學含有對外的性質：「溯中國公學之所由起，蓋權輿與留日學生爭取締規則之

故。夫此次之爭之當否，今姑無論，然公學……含有對外之性質，蓋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國公學不啻我中國民族能力之試金石也者。……如不能成立發達，亦即我全國人能力劣敗之代表也。」

(二) 中國公學可以消除省界：「中國自今以往，有大問題焉，……則省界之分是也。……夫惟中國公學鎔全國人材於一爐，破除畛域，可以消禍於無形。」

(三) 中國公學爲民立大學之基礎：「考各國學術之進化，莫不有民立學堂與官立學堂相競爭，相補救。……今我中國公學實爲中國前途民立大學之基礎；若日進不已，其成就將能駕耶魯大學與早稻田大學而上之。」

他爲什麼要自殺呢？他說：

「我同志等組織此公學也，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擔任義務，權何有？利何有？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顧，勞勞於此公學者，誠以此公學甚重大，欲以我輩之一腔熱誠，俾海內熱心之仁人君子憐而維持我公學成立，扶助我公學發達耳。乃自開辦以來……海內熱力贊助者，除鄭京卿孝胥等數人外，殊寥寥。求助於政府無效，求助於官府無效，求助於紳商學界又無效。非獨無效，且有讒視我公學，毀謗我公學，破壞我公學者。」

「我性褊急，我誠不忍坐待我中國公學破壞，……故蹈江而死，以謝我無才無識無學無勇不能扶持我公學之罪。」「夫我生既無所補，即我死亦不足惜。我願我死之後，君等勿復念

我，而但念中國公學。」「我願我諸同學皆曰，無才無學無勇無識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竭力求學以備中國前途之用。」「我願我諸同事皆曰，無才無學無勇無識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振起精神，盡心擴張，無輕灰心，無爭意見，……務扶我中國公學爲中國第一等學堂，爲世界第一等學堂，而後已。」

「我願四萬萬同胞……皆曰，無學無識無才無勇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貴者施其權，富者施其財，智者施其學問籌劃，以共維持扶助我中國公學，……則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姚烈士的屍身和遺書發現之後，全國社會受一大震動，贊助公學的人稍多；同志諸人受他深刻的刺激，也振作精神，向各處奔走求助。一年之後，因鄭孝胥、熊希齡諸先生援助，兩江總督端方允於丁未年起每年由兩江捐萬二千元，又撥吳淞公地百餘畝爲校址。次年（戊申）又得大清銀行營口經理羅詒先生借助銀十萬兩爲建築校舍之用。這幾年奔走四方募款，以公學幹事張邦傑、王敬芳、黃兆祥諸先生之力爲最多：張邦傑先生於宣統己酉年扶病監督校舍工程，盡瘁而死，遂葬於新校舍之側。後來湖北、浙江、四川、江西各省相繼補助常款，故宣統末年公學每年常款有兩萬餘元。

公學初不設校長，只有公選的幹事，分任庶務、教務、庶務的事。後來推鄭孝胥先生爲校長，聘馬君武先生爲總教。君武先生不久即往德國留學，總教之職也就廢了。公學得兩江津貼之

後，校長改爲監督。戊申春間，鄭孝胥先生辭監督，夏敬觀先生繼任爲監督。其時有董事會之設，推張謇先生爲會長。

公學校舍初在北四川路黃板橋之北。戊申年（一九〇八），即吳淞新校舍完成之前一年，公學學生與幹事部爭論學校組織的問題，意見各走極端，多數學生退出公學，在愛而近路慶祥里組織中國新公學，至己酉年（一九〇九）之冬始解散。

留校學生於己酉年遷入吳淞新校舍。

我是丙午年夏間考進中國公學的，在校兩年多，在中國新公學又留一年，我現在回想當日公學的精神，有最可記念的幾點：

第一：中國公學真可算是全國人的公共學校，學校在上海，而校中的學生以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爲最多，其餘各省的人差不多全有。學生說的話是「普通話」，講臺用的也是「普通話」。我當時只能說上海話與徽州話，在校一年多，便說四川話了。二十年來，上海成爲各省學生求學之地，這風氣不能不說是中國公學開出來的。

第二，中國公學是革命運動機關。我那時祇有十幾歲，初進去時，只見許多沒有辮子的中年少年，後來才知道大多數都是革命黨人，有許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學，還和我同住過，我只知道他姓盧，大家都叫他「老盧」，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學之中死於革命的，我所能記憶的有廖德璠，死於端方之手；饒可權死於辛亥三月廣州之役，爲黃花崗七十二

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參與廣州之役。教員之中，宋耀如先生爲孫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馬君武、沈翔雲、于右任、彭施瀝諸先生皆是老革命黨。中國公學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黨的旅館，章炳麟先生出獄後即住在這裏，戴天仇先生也曾住過，陳其美先生也時時往來這裏。有時候，忽然班上少了一兩個同學，後來才知道是幹革命或暗殺去了。如任鴻雋忽然往日本學工業化學去了，後來才知道他去學製造炸彈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同汪精衛、黃復生到北京謀刺攝政王去了，所以當時的中國公學的確是一個革命大機關。

第三，中國公學的組織是一種民主國的政體。公學的發起人多是革命黨人，故學校成立之時，一切組織多含有試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執行與評議兩部。執行部的職員是學生投票互選出來的，有一定的任期，並且對於評議部負責任。評議部是班長和室長組織成的，有定期的開會，有監督和彈劾職員之權。開會時，往往有激烈的辯論，有時到點名熄燈時方才散會。姚烈士絕命書中所謂「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指這種制度。

丁未以後，學校受了兩江的補助常款，端方借此要監視這個有革命嫌疑的學校，故不久即委派監督，學校有了官派的監督，民主的政體，便發生了障礙，幹事部久不改選，評議部也有廢止的危險。到了戊申之秋，評議部與職員發生激烈的衝突，結果遂致絕大多數學生整隊退學，自行組織中國新公學，仍繼續實行民主政治，支持至一年餘始解散。這三年多的雛形民主國，在中國政治革命史上是很可記念的。

辛亥革命之後，各省財政多感困難，故中國公學的補助費一律停止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袖諸公承認公學在革命史上的重要，故臨時參議院通過於清理源豐潤銀號倒欠政府款項下，撥給中國公學基金三百萬元。孫中山、黃克強、宋教仁諸先生皆加入校董會，先籌款開學。後來政府北遷，「三百萬元」基金之案迄未實行，後雖由元年國務會議改為一百萬元，亦未撥付分文。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來，公學校舍被革命軍借住，學生分散，公學遂暫時停頓了。自民國三年至五年，中國公學得繼續開學，全靠王敬芳、胡汝麟兩先生維持之功。其時王、胡兩君代表河南同鄉與英商福中公司爭礦權，至民國四年夏間，交涉完畢，成立福中總公司，胡、王兩君要求福中公司每年提出五萬元，以三萬元補助河南公益事業，以二萬元捐助中國公學。公學得有常款，此為第二次。

民國五年，政治多故，學生驟減少；舊有之專門班畢業後，僅餘中學生數十人，帝制既倒，學校當局想把公學改為大學，遂決計結束舊局，把中學分送上海各中學。其時中國參加歐戰，德國人所辦之同濟醫工學校陷於停頓地位，教育部與中國公學商借吳淞校舍為同濟臨時之用，中國公學遂又暫時停辦。

同濟學校借用公學校舍數年之久。民國八年夏間，公學暫借威海衛路德國人辦的小學校舍，先行開學，次年始將校舍收回。其時董事會改組，推熊希齡先生為會長，王家襄先生為副會長，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濤、夏敬觀、葉景葵、梁維嶽、王敬芳七人為常務董事，王敬芳先生任校